

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 运动史

从产业革命到希特勒攫取政权

上 卷

第 二 册

〔美〕 卡尔·兰道尔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

从产业革命到希特勒攫取政权

上 卷

从产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时期

第二册 1914—1924 年

〔美〕卡尔·兰道尔 著

群 立 译 南 木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4年·北京

上卷 第二册

目 录

第六篇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社会主义 (1914—1918年)

第十八章 大战的原因和社会主义者的立场	658
第十九章 大战爆发	665
为和平作最后努力	665
德国的“八月四日”	667
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者主张捍卫祖国	670
英国的犹豫态度	678
俄国社会主义者中的反战多数派	678
奥地利社会主义者的困境	682
中立国家的社会主义	683
护国主义的立场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吗?	687
第二十章 反对派的出现	693
和平主义者和革命派	693
右翼为复兴国际而努力	698
反对派成为一支力量	701
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701) 齐美尔瓦尔得和 昆塔尔会议(704) 党内冲突的加剧(712)	
第二十一章 1917年徒劳的和平努力	724
德国的和平决议和贝特曼-霍尔威克的下台	724
教皇斡旋和平的努力	734

通过谈判取得和平为什么没有实现?	736
第二十二章 俄国革命	743
沙皇制度的覆灭	743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747
布尔什维克返回俄国	749
和平与土地问题	761
布尔什维克的进展和挫折	765
一败涂地的七月攻势	768
科尔尼洛夫叛乱	772
布尔什维克的胜利	776
第二十三章 召开斯德哥尔摩会议的计划	791
俄国二月革命的反响	791
召开会议计划的产生	792
协约国政府使会议计划遭到失败	800
布尔什维克和斯德哥尔摩会议	805
斯德哥尔摩会议计划的潜在意义	810
第二十四章 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开创时期	819
夺取政权以前的纲领	819
和平政策	825
实抚农民	834
部分国有化和工人监督	836
专政的建立	841
第二十五章 大战最后阶段中的社会主义运动	863
主和派在法国从少数变成多数	863
协约国社会主义者的声明	865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鲁登道夫的半独裁统治	867
第二十六章 德国革命	874
军事序曲	874
鲁登道夫的停战要求和麦克斯亲王内阁	877

水兵的骚乱.....	884
巴伐利亚的革命.....	888
德皇退位问题和柏林革命.....	891
人民委员的政府.....	899
奥地利革命.....	903

第七篇 战后危机时期的欧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919—1924年)

第二十七章 俄国的内战	918
赤色分子和白卫分子之间的军事和政治斗争.....	918
初期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918) 协约国干涉的开始(921) 白军的进攻 和布尔什维克的防御(930) 赤色恐怖(936) 在围困中的布尔什维主义 (944) 白卫军进攻的失败(952) 白卫军的崩溃(960) 斗争的最后阶 段: 弗兰格尔和波兰(966) 悲剧性的插曲: 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 克(972) 反革命运动为什么会失败呢?(975) 内战的余波(982)	
反对白卫分子的战争期间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发展.....	988
战时共产主义(988) 宗派主义和对“党内民主”的限制(1000) 战时共 产主义的最后阶段(1005) 喀琅施塔得叛乱和新经济政策(1008) 大饥 荒(1015)	
第二十八章 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	1037
伯尔尼会议	1037
第三国际的成立	1043
为国际无产阶级的统一作出的努力	1049
第二国际的恢复	1051
苏联对殖民主义的攻击	1054
第二十九章 魏玛共和国	1061
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武装冲突	1061
民主还是无产阶级专政?(1061) 内战的威胁(1065) 德国国防军的起 源(1071) 诺斯克以很高的代价取得成功(1074) 选出国民议会(1075)	

共产党人的新攻击(1078)	
巩固	1085
承认凡尔赛和约(1085) 魏玛宪法及其问题(1087)	
第一次反革命行动	1104
右派的骚动(1104) 心怀不满的士兵(1106) 叛乱者攻占柏林(1111)	
总罢工和束手无策的独裁者(1112) 冲突和混乱的局面破坏了民主的胜利(1113) 社会主义者在竞选中的失败(1119)	
第三十章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1133
背景	1133
战后时期的激进主义(1133) 法西斯主义的根源(1138)	
墨索里尼组织法西斯运动	1144
“初期法西斯运动”(1144) 为雇主服务的法西斯恐怖(1149) 法西斯主义的保护人(1154)	
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	1157
法西斯胜利的前奏	1159
“和平协议”(1159) 法西斯组织的巩固(1161) 阶级斗争使反法西斯派分裂(1166) 总罢工和“突击队主义”的新浪潮(1169)	
法西斯主义的胜利	1174
进军罗马(1174) 领袖其人(1180)	
第三十一章 通货膨胀时期的德国社会主义	1195
左派的分裂	1195
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哈雷代表大会(1195) 暴乱使共产党人分裂(1198)	
社会民主党人重新参加政府	1205
普鲁士的倒退(1205) 赔偿危机;天主教派需要社会民主党人(1206)	
魏玛联合内阁和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	1211
“民族积极分子”的战斗小组(1211) 阿道夫·希特勒(1215) 埃尔茨伯格的被暗杀和维尔特同巴伐利亚的冲突(1219) 新的波折和新的希望(1222) 履行和约的困难(1227) 大胆的尝试:拉巴洛条约(1228) 拉特瑙遭到暗杀和维尔特内阁倒台(1230)	
德国社会主义的统一	1234

没有同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	1239
进占鲁尔区及其后果	1243
“消极抵抗”时期(1243) 鲁尔斗争的结束(1262)	
第三十二章 恢复常态	1290
初步的稳定	1290
道威斯计划	1294
转向保守主义	1296
右派在选举中的胜利(1296) 资产阶级集团的政府(1300) 从艾伯	
特到兴登堡(1302) 共和国的巩固及其漏洞(1305)	
第三十三章 法国改良主义在两条战线上获得胜利	1313
红色的幻想	1313
改良主义者领导工会	1316
大罢工	1319
法国工人的分裂	1323
共产主义浪潮的衰落	1328
社会党人和建立联盟问题	1331

第 六 篇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 社会主义

(1914—1918年)

第十八章 大战的原因和 社会主义者的立场

社会主义者为维护和平而进行的努力落空了。到了1914年8月1日,原来希望各大国政府会慑于无产阶级的骚动、破坏或总罢工而采取和平态度的那种想法也消失了。只要社会主义者确曾进行威胁,并使战争实际上打不起来,他们本来是可以使敌对状态终止的;他们对群众的影响虽然不小,却仍不足以使他们采取这种政策,即使他们在思想和组织上已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宣战之后,各社会主义政党便陷于被动,只是到了战争的后一阶段,它们才重新获得充分的行动自由去执行自己的政策。

不明确战争的性质和某一方战胜会带来什么后果,就不能充分理解社会主义者的立场。1914年爆发的欧洲冲突并非由于一个国家的独立存在同另一个国家的生存互不相容,以致以最大的智慧和克制也无从防止的那种不可避免的争端。这种形势当时只有在东方才存在。奥匈帝国的斯拉夫民族争取独立是不可避免的。哈布斯堡王朝反对这种志在扼杀王朝的迫切愿望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俄国支持斯拉夫人的独立运动也是由和平力量所无法控制的强大因素决定的。

西欧和德国的形势就不同了。1914年,不管是英国、法国和德国,都没有怀着那种自认为有理由诉诸武力的野心。法国固然希望收复它在1871年丧失的阿尔萨斯-洛林,但法国的历届政府都不能公开提出要以战争手段收复失去的两个省份。德国想扩张殖民地,因此而遭到英国的抵制,但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国

已拟订了殖民地协定，这些协定本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使双方都感到满意。^①

在英德两国之间争夺市场，正如互有矛盾的领土要求一样，也不是大动干戈的直接原因。英国是德国的最好雇客，^②德国也购买大量的英国货物。此外，德国的出口贸易常常利用英国的船只，而且更经常利用英国的银行和保险业务，从而使英国的公司获得大量利润。对双方来说，为将来可能得到的金钱利益而诉诸战争，都是愚不可及的。不管是德国还是英国，都没有干这种蠢事。德国的出口工业——英国制造商的商业劲敌——是主张和平的，伦敦金融界也是如此。^③1914—1918年的战争不是一场为掠夺而进行的战争。它是一场由于恐惧而造成的战争。

奥地利担心的是，如果它不用武力去反抗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就会使它的薄弱组织崩溃。德国害怕的是，如果它的唯一盟国奥地利或屈服于俄国的武力、或逐渐解体、或由于它不给予支持而使奥地利疏远，它就会陷入完全孤立的地位。法国认为，它不能听任自己的盟友俄国为德奥联盟所挫败，因为这样它就会受到德国军国主义的攻击而得不到另一个大陆强国的援助。英国则认为，如果它坐视德国消灭法俄两国的力量，就等于是甘冒无法容忍的危险。从德国舰队的不断扩充来看，情况尤其是这样，因为德国舰队的扩充似乎意味着不列颠群岛的安全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只有在俄国，扩张势力——不是以获得领土的形式，而是通过君临巴尔干各国的某种霸主地位——才是那些根据宪法负责方针大计的人们诉诸战争的主要动机。

奇怪的是，战争暴发的时候，正是两个主要参战国——德国和英国——由抱有和平愿望的人士主持国家大计的时候。阿斯奎斯首相是主张和平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虽自称是“自由帝国主义者”，但决不相信暴力。德国首相冯·贝特曼-霍尔威克

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保守分子，深信战争是他所要维护的那种文明的最大危险。德皇确是一个穷兵黩武的人；他既懦弱又爱好虚荣，今天可能因醉心于武功而不能自持，明天又会把自己描绘成和平之王。不过，他并不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甚至他的最大缺点——缺乏道义上的勇气——也同好战政策不相容。他并不不要战争，因为他既不是一个残酷的人（虽然普遍流传着与此相反传说），也不是一个赌棍，而且很懂得，武装冲突会使德国和他的王朝陷入危险之中。但与此同时，他又不能毅然放下那种以霸主自居的不可一世的姿态，他既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又增加了一支实力雄厚的海军。德国的海军军备，几乎完全是德皇虚荣心的产物。即使从军事观点来看，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对德国也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舰队决不可能同英国的舰队相匹敌，而只能招致英国的敌视，迫使英国投入法国和俄国的怀抱。

当然，在这几个国家里都有主战派，但只有在俄国和奥地利，主战派才处于支配地位。不论是想发动战争的德国参谋部、准备以血的代价去换取阿尔萨斯-洛林的解放的少数法国人，还是想在德国拥有更强大的海军实力之前就消灭德国的英国人，这时都还不能左右本国的政策。这些主战派的影响只能通过秘密的方式起作用。我们还不完全了解各种在幕后牵线的小集团的全部密谋诡计，它们对造成政治家们卷入的那种灾难性的局面可能要负很大责任。我们所能清楚看到的，只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议会中的多数和正式负责外交政策的人士都具有和平的意愿。

但是，这些国家及其领导人保持和平的意志并没有占优势。显然，造成这一后果的责任必然在于1914年实行的制度。如果一些最强大的国家是由好战的人物统治的，任何政治或社会制度自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但是，希望制度能使主张和平的政治家拯救世界，使人类免遭大屠杀，也不能算要求过高。要是领袖或沉醉于

外交游戏，或为群众的一时激情所麻痹，或陷入战争贩子集团的圈套，那么，对这种使和平努力遭受如此严重的挫折的制度进行谴责，自然是正当的了。

制度方面的一个主要缺陷是，缺乏一个世界性组织。如果当时有一个国际联盟，那它的所属机构就很可能推迟战争的爆发。通过这种方式赢得时间，可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如果有机会继续进行谈判，外交家们就可能拟出一套和平解决方案。

经济制度是造成这种巨大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它加深了国与国之间的不信任感，它允许未得到满足的冒险欲望在个人头脑里滋长。欧洲的民族，尤其是德国人和英国人，已经惯于怀着那种在竞争者之间常有的敌意去看待对方。这样，经济上的敌对虽然并不是导致大战的许多问题的根源，但却助长了一种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要进行调解就不可能了。

同样重要的是，一般人的厌战情绪——和平的最大保证之一——在1914年不及在其他时期那样强烈。在外交危机达到顶点以前的几个星期或几天，战争恐惧一直支配着公众的思想。接着，冒险的欲火突然燃起。男人们觉得，离开办公室或店铺，把抚养家庭的责任交给政府，暂时去干一些和折磨他们的苦役完全不同的工作，是多么痛快的事。工业文明的枯燥无味及其所带来的令人窒息的劳役，说明这些国家的成百万士兵为什么会兴致勃勃地走向战场。但是，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从1914年秋天起那种在几个星期的动员行动中得以保持的吸引力，终于被战壕里的沉闷和污浊破坏得干干净净，但在7月和8月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里，政府不仅可以指望人们自愿响应入伍号召，同时还可指望他们热情地响应这个号召。

当社会主义者考虑战争的起因时，他们可以举出许多理由公开反对战争。他们一直在抨击对造成这次巨大灾难负主要责任的

无组织状态和竞争制度。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因而人们自然就以为，他们会利用手边的一切武器在加强他们的指责。大多数中立观察家都以为，交战国的社会主义者会举起反对本国政府的大旗。因此，当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和比利时的社会主义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党一道对保卫国家表示支持时，他们的国外同志就认为这是大背叛。

批评家忽略了这一点，即当战争已成为事实时，战争的起因相对说来就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战争的后果。在开战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本会意味着战胜国的军国主义的胜利。如果在宣战后的几个星期内德军就迫使法国和英国屈膝，那么，德国就可以不付什么代价而得到比利时、法国北部和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如果法军于1914年年底以前就同俄国的“强大优势兵力”在柏林会师，那么，法国、俄国和英国当时所获得的至少可以同德国在1918年所失去的相等，而且还很可能大大超过。总之，付出较小的牺牲就能获得战利品，必然会使战胜的民族产生这样的想法：战争是值得的，和平主义者的忠告是不切合实际的，可以置之不理。而且随着社会主义者和其他爱好和平的人士陷于无能为力的处境，战胜国的军国主义者就必然会任意侮辱被征服者。

在战争爆发时，社会主义者还不能像我们今天这样看清这些事实，但在各个国家中，他们毕竟充分认识到，他们不能为本国的战败承担责任。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一想到自己的国家可能要向之屈膝的那个政权，就觉得失败有特别可怕的一面。法国人唯恐德国的胜利会使他们丧失民主权利，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也同样害怕俄国的胜利会使他们丧失德国自1871年发展以来所获得的民主。这两种见解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对德国的民主来说，如果德国迅速获胜，也是危险的，简

直就同俄国获胜一样的危险。

协约国一开始就把这次战争说成是反对德国专制制度和保卫民主的斗争。在美国参战之后，更大肆强调这种说法。这种说法不是单纯的宣传，但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保卫自由政体，并不一定要对德作战。在1914年，德国正稳步地在民主的道路上行进，只要和平得以维持，它是不会威胁邻国的自由制度的。恰恰相反，这种局面倒是由于战争的爆发而改变了。德国的军队如果获胜，就会毫不留情地打击德国的民主力量。这些民主力量虽不至于被消灭干净，因为霍亨索伦王朝大概还无法实行露骨的极权主义，但是国会和国会中的各个政党在国家生活中必然会长期退居十分次要的地位。如果德国战胜，就无疑会吞并过去实行民主制度的地区。另一方面，德国取得俄国的领土，对民主并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德国不大可能授予这些地方的居民以公民权。由此可见，那种以为德国的胜利就是民主的失败的想法是很有根据的，而且这种失败甚至还会在自由制度未受到直接打击的地方损害人们对自由制度的信念。

如果能通过一次和平谈判使战争在1916年或1917年结束，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就会得到最大的好处。这样的战争结局就不会使任何交战国对战争的危害抱有错觉，而会使它们深信不疑，将来必须同心协力尽最大努力去保卫和平。这样，那种会把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保持下去的胜利情绪或失败痛苦，都不会存在。1918年的大战结束更易于导致军国主义精神的复活，但是它对政治进步所起的阻碍作用却又不像一次迅速的胜利——特别是德国的迅速胜利——那么巨大。

第十八章注

① 其中一个条约是关于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的。英国赞同把这些殖民地转 让

给德国,并多少暗示,它会支持德国对里斯本的要求。对于这个协定的价值,德国外交界的看法很不一致,因为德国的利益取决于葡萄牙是否愿意出售其殖民地。另一个条约撤除了英国对德国经手的(虽不是完全由德国提供资金)巴格达铁路工程所设下的障碍。这两个条约都载于德国官方编纂的《德国战争文件汇编》第37卷;1。英文译文见《德国外交文件,1871~1914年》,1931年版,第13和14章。巴格达条约必须连同有关德、奥、意在同一时间就小亚细亚铁路问题进行谈判的文件一起阅读。见《德国战争文件汇编》,第37卷;2。从后一部分文件显然可以看出,在土耳其领土上取得修筑铁路和港口的特权就是决定势力范围(按德国的术语,叫作“工作范围”)的一种方法,一旦到瓜分土耳其时,这些势力范围就成了享有特权的国家的殖民地或保护地。通过条约的整个结构,英国使德国有明确的理由希望(虽然还不是明确的保证),它在非洲的有限领地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即使不是完全连接在一起的)南非帝国,并在瓜分小亚细亚时分得最好的一份。

② 《1914年德国国会统计年鉴》第288页表明,在1933年*,英国输入了德国全部输出的14.2%。这还不包括德国同英国的自治领土和海外领地的贸易,也不包括任何间接运往英国的货物。德国对荷兰的输出占6.9%,对比利时占5.5%,其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转运到不列颠群岛。

③ 见奥托·哈曼的《被人误解的俾斯麦》,1921年版,第144页所引证的德国驻伦敦大使梅特尼希伯爵的报告:“德英之间的政治关系近来之所以紧张,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商业上的关系,而在于我国海军力量的日益增强,这是英国所害怕的。如果战争与和平取决于伦敦市的大商贾,我们就无需害怕同英国发生战争了。这些人一想到战争就发抖。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他们害怕英国的巡洋舰(三十艘重巡洋舰和八十三艘轻装甲巡洋舰)面对我们的巡洋舰(七艘重巡洋舰和二十七艘轻装甲巡洋舰),保护不了英国的供应线,而在于他们了解:在一场战争中,全部都要受损,英国投放在外国企业中的资本——英国财富的最重要的部分——要遭受重大的损失,商业关系所依靠的稳定局面会消失,最后,战争会以公债的形式把本应于事后取得的款项吞没掉。”

* 原文如此,疑为1913年之误。——编者

第十九章 大战爆发

为和平作最后努力

社会主义者的反战斗争一直进行到战争爆发的时候。1914年7月，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自始至终都在组织声势浩大的争取和平群众大会。7月29日在柏林举行的大会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社会主义报刊谴责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冒险行动，并继续用革命来威胁政府。

7月29日，社会主义国际局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它通过了一项恪守中立路线的决议，要求调解奥地利—塞尔维亚冲突——这是一个包含着极其严重而又迫在眉睫的危险的问题。国际局劝告各国社会主义者支持这些努力：

为了使德国在奥地利采取缓和的行动，为了使法国从俄国取得不
参与冲突的谅解，德国和法国的工人，将对他们的政府施加最大的压
力。而英国和意大利的工人也将竭尽全力支持这些努力。①

更重要的是国际局所组织的公众示威游行，欧洲主要国家的代表都参加了这一游行。胡果·哈阿兹（他继倍倍尔之后正式担任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领导）代表社会民主党发表的声明同在德国举行的一些大会的宗旨完全一致。他谴责奥地利没有接受塞尔维亚对最后通牒作出的和解性答复，这份最后通牒是奥地利政府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后送往贝尔格莱德的。哈阿兹宣称：

奥地利显然想依靠德国。但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声明，秘密条约不能约束无产阶级。德国无产阶级认为，即使俄国〔站在塞尔维亚一边〕插手干涉，德国也不应该〔站在奥地利一边〕插手干涉。^②

在饶勒斯的演说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调子。他再一次有力地表达了和平主义的信念，并对德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在原则上达成协议一事感到高兴，同时用战后掀起革命来威胁两国政府。他还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沙皇政府拒绝和解建议，法国就不应援助俄国，尽管它同俄国订有同盟条约。“我们只知道一种条约，这就是把我们同人类联系在一起的条约。”^③但他在同一篇演说中又对法国政府表示信任：

我们的政府是提倡和平的。谈到我个人，由于我有争取法德和解的决不致落空的强烈愿望，我对承受我国主战派的敌视从没有表示过畏缩，我有权利说，法国政府目前是要求和平的，而且也正在为维持和平而努力。^④

极其可能的是，法国政府确曾在这个时刻对俄国施加影响，促其采取和解态度，正如德国——姑不论它前几个星期采取了什么错误行动——这时正力图约束奥地利一样。饶勒斯的论点确定了西欧和中欧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几天之后所采取的立场。

法国社会党人首先表现出这种态度并不是偶然的事，这也不单纯是革命的爱国主义传统所致，这种传统在法国一向非常深厚。法国政府已对社会党的主要代表表示信任，并向他们解释了政府的政策。饶勒斯就是在法国总理维韦安尼——过去也是社会党人——所提供的情报的影响下发表演说的。法国社会党人似乎已经得到了法国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宣战的保证。^⑤这个保证简直同